



以数字法治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

上海：从办好一个案子到破解一类难题



编者按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“十五五”发展的宏伟蓝图。法治，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——经济社会发展每向前推进一步，法治服务保障就要跟进一步。近日，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组织的“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·上海法院见闻”集中采访，走进上海市三级法院，来到司法实践的最前沿、服务群众的第一线，近距离观察和感受人民法院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、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扎实成效。



图片由人机协同生成

法院推广，对已结案件在线评查。”陆诚介绍，经充分论证，这一应用场景的评查模型转为预警模型嵌入办案系统，如出现符合该业务规则的在办案件，系统会适时向办案法官推送预警信息，实现从“事后监督”向“事前预警”的转变。

截至目前，“假离婚、实逃债”的应用场景已经推送预警提示1708次，800多个类似应用场景嵌入办案系统，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，覆盖全市法院92%的法官。

“数据并不天然产生价值，数据在碰撞中才有价值。”陆诚表示，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持续推进，数据不再停留于“可用”，还要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。

上海高院发动广大一线法官研发了一系列的审判场景模型，“通过司法大数据的分析比对，自动提醒法官不出错，同时也智能引导法官怎么审。”陆诚举例，针对办案过程中的易错点，上海高院研发了当事人死亡、企业注销、职业放贷人智能识别等一系列的提示预警场景模型，对法官办理同类案件可以实现系统性预警。

通过“适法统一、裁判规则指引”等模型，上海高院推动“一个案件”全流程监管辐射至“一类案件”的专业化审判，延伸至“一域问题”的协同性治理。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，法院研发了案件证据智能抓取、涉案金额智能计算、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等功能，推动相关案件审理周期从原来的90天缩短到45天。

守护老百姓的“钱袋子”

数字法治不仅帮助法官审案子，也能实实在在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。

预付式消费治理一直是民生领域的“痛点”问题之一，常见于教育培训、健身、美容等民生服务行业。随着预付式消费的迅猛发展，机构“爆雷”“跑路”频频出现，导致众多消费者面临退款难、维权难的困境。

2019年1月1日起，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实施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牵头建设了全市统一的“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”，要求发卡经营者将经营基本情况、预收资金情况、风险防范情况在平台登记备案，以实现实时监控。

“然而，实践中，仍有一些企业为逃避监管不按规定进行备案，导致相关部门和消费者都无法掌握企业的经营信息及发卡情况，也无从判断和防范风险。”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高院”）法官陆诚介绍，基于此，办案法官从相关案件中总结了三个普遍特征：离婚当事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、男女双方自行达成调解、约定由一方明显多分财产。陆诚表示，将业务规则“翻译”成机器看得懂的技术语言，法官就可以在数字建模平台上，通过“拖拉拽”的方式完成数字模型构建。

依托数字模型对全市法院案件进行大数据筛查、碰撞、比对、排查可能存在“假离婚、实逃债”的案件线索，自动生成线索清单，紧接着，上海高院将模型生成的清单发送全市法院进行人工核验，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规则。

“达到一定精准度后，该评查模型正式向全市

法院推广，对已结案件在线评查。”陆诚介绍，经充分论证，这一应用场景的评查模型转为预警模型嵌入办案系统，如出现符合该业务规则的在办案件，系统会适时向办案法官推送预警信息，实现从“事后监督”向“事前预警”的转变。

截至目前，“假离婚、实逃债”的应用场景已经推送预警提示1708次，800多个类似应用场景嵌入办案系统，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，覆盖全市法院92%的法官。

“数据并不天然产生价值，数据在碰撞中才有价值。”陆诚表示，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持续推进，数据不再停留于“可用”，还要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。

上海高院发动广大一线法官研发了一系列的审判场景模型，“通过司法大数据的分析比对，自动提醒法官不出错，同时也智能引导法官怎么审。”陆诚举例，针对办案过程中的易错点，上海高院研发了当事人死亡、企业注销、职业放贷人智能识别等一系列的提示预警场景模型，对法官办理同类案件可以实现系统性预警。

通过“适法统一、裁判规则指引”等模型，上海高院推动“一个案件”全流程监管辐射至“一类案件”的专业化审判，延伸至“一域问题”的协同性治理。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，法院研发了案件证据智能抓取、涉案金额智能计算、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等功能，推动相关案件审理周期从原来的90天缩短到45天。

“然而，实践中，仍有一些企业为逃避监管不按规定进行备案，导致相关部门和消费者都无法掌握企业的经营信息及发卡情况，也无从判断和防范风险。”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高院”）法官陆诚介绍，基于此，办案法官从相关案件中总结了三个普遍特征：离婚当事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、男女双方自行达成调解、约定由一方明显多分财产。陆诚表示，将业务规则“翻译”成机器看得懂的技术语言，法官就可以在数字建模平台上，通过“拖拉拽”的方式完成数字模型构建。

依托数字模型对全市法院案件进行大数据筛查、碰撞、比对、排查可能存在“假离婚、实逃债”的案件线索，自动生成线索清单，紧接着，上海高院将模型生成的清单发送全市法院进行人工核验，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规则。

“达到一定精准度后，该评查模型正式向全市

法院推广，对已结案件在线评查。”陆诚介绍，经充分论证，这一应用场景的评查模型转为预警模型嵌入办案系统，如出现符合该业务规则的在办案件，系统会适时向办案法官推送预警信息，实现从“事后监督”向“事前预警”的转变。

截至目前，“假离婚、实逃债”的应用场景已经推送预警提示1708次，800多个类似应用场景嵌入办案系统，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，覆盖全市法院92%的法官。

“数据并不天然产生价值，数据在碰撞中才有价值。”陆诚表示，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持续推进，数据不再停留于“可用”，还要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。

上海高院发动广大一线法官研发了一系列的审判场景模型，“通过司法大数据的分析比对，自动提醒法官不出错，同时也智能引导法官怎么审。”陆诚举例，针对办案过程中的易错点，上海高院研发了当事人死亡、企业注销、职业放贷人智能识别等一系列的提示预警场景模型，对法官办理同类案件可以实现系统性预警。

通过“适法统一、裁判规则指引”等模型，上海高院推动“一个案件”全流程监管辐射至“一类案件”的专业化审判，延伸至“一域问题”的协同性